

试论楚系青铜爬兽

文 席 乐

[内容摘要] 本文从楚系青铜爬兽类型分析入手, 得出楚系青铜爬兽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多装饰于楚式升鼎和壶等器物上的结论。接着结合西周文化的爬兽特点, 提出楚系青铜爬兽来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的观点。然后对楚系青铜爬兽器的使用者身份考察, 可知其多为楚文化圈的高级贵族使用。而楚文化圈陶质爬兽多见于下大夫和士等较低等级的贵族阶层。楚系青铜爬兽是东周时期青铜器风格转变的产物。东周时期晋文化圈是青铜爬兽器另一处流行的区域, 其与楚系青铜爬兽有不同特点。同时各区域可见的爬兽耳罍是东周文化圈文化认同的象征, 本文进而认为这种文化认同是秦国实现大一统的基础。

[关键词] 楚系 青铜爬兽 器类 身份

爬兽是楚系青铜器的重要附件, 其流行于东周时期楚文化圈内, 以新郑郑公大墓、浙川下寺楚墓、随州曾侯乙墓等出土的爬兽最为多样。一般认为, 爬兽是楚人发明的, 代表楚文化特质^①, 但现有资料显示, 爬兽起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在楚系青铜爬兽流行时代, 晋国等一些诸侯国也流行青铜爬兽, 其形制、器用制度似乎与楚系青铜爬兽有区别。基于上述情况, 有必要对楚系青铜爬兽作进一步的讨论。因此, 本文拟从楚系青铜爬兽的类型分析入手, 讨论其来源和使用者的身份, 进而探讨同时期其他区域青铜爬兽特征, 最后阐释青铜爬兽对东周时期青铜器风格转变的作用。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一、楚系青铜爬兽的形式划分及年代

本文所指的爬兽是直接攀附在青铜器器壁上的动物造型, 非立于青铜器顶部的动物造型, 也非支撑器物的动物造型。

(一) 楚系青铜爬兽的形式划分

楚系青铜爬兽总体特征是: 多为龙形, 或吐长舌, 体态修长, 卷尾。根据兽头朝向可分为两型:

A 型回首。根据角的大小、身体卷曲程度分为两式:

I 式为繁缚的大角, 曲颈垂首吐舌成环, 塌背为主。河南叶县旧县乡 M4 楚式升鼎^②, 河南新郑郑公大墓龙耳方壶(图 1-1)^③, 河南浙川下寺 M1 方壶、M2 鬲^④, 河南上蔡郭庄 M1 方壶^⑤, 湖北随州刘家崖方壶(图 1-2)^⑥, 湖北随州枣树林 M190 方壶^⑦, 安徽寿县蔡侯墓方壶(图 1-3)^⑧等均属于此式。

II 式为角不明显, 昂首, 拱背为主。河南浙川徐家岭 M10 圆壶^⑨,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簋、圆壶、圆尊(图 1-4)^⑩, 湖北随州擂鼓墩 M2 方壶^⑪, 湖北随州文峰塔 M46 方壶^⑫, 湖北荆州天星观楚式升



图 1-1 新郑郑公大墓龙耳方壶



图 1-2 随州刘家崖方壶



图 1-3 寿县蔡侯墓方壶



图 1-4 随州曾侯乙墓圆尊

图 1-A 型楚系青铜爬兽

鼎 M2: 115^⑬, 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方壶、M1 簋^⑭、M2 圆壶^⑮, 湖北荆门子陵岗 M64: 2^⑯,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曾姬无恤方壶^⑰, 广西恭城金堆桥 M^⑱等属于此式。

B 型背首。根据爬兽的整体造型可分为两型:

Ba 型立体爬兽, 身体各部位明显。又根据角的大小、器身纹饰可分为两式:

I 式的兽角较大, 器身遍布繁缚纹饰。

河南浙川下寺 M1 楚式升鼎^⑲、M2 王子午鼎^⑳、M2 铜禁(图 2-1)^㉑, 湖北荆州天星观 M2 楚式升鼎^㉒,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圆盘^㉓等属于此式。

II 式的兽角较小或不明显, 器身饰简单纹饰或光素。安徽寿县李三孤堆铸客鼎^㉔、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楚式升鼎(图 2-2)^㉕、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楚式升鼎(图 2-3)^㉖、湖北荆门包山 M2 楚式升鼎^㉗、湖北随州文峰



图 2-1 浙川下寺 M2 铜禁



图 2-2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楚式升鼎



图 2-3 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楚式升鼎

图 2-Ba 型楚系青铜爬兽



图 3-1 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别人守门方鼎



图 3-2 宝鸡茹家庄窖藏别人守门方鼎



图 3-3 宝鸡茹家庄窖藏别人守门方鼎



图 3-4 西安张家坡邓仲牺尊



图 3-5 扶风庄白村鬯父盃



图 3-6 扶风齐家村窖藏盃

图 3 西周文化青铜爬兽

塔 M18 方鉴^⑧、湖北荆州天星观 M2 罍^⑨、湖北荆州天星观 M1 楚式鼎^⑩等属于此式。

Bb 型片状爬兽，身体有些部位简化。安徽寿县蔡侯墓楚式升鼎^⑪，河南淅川和尚岭 M1 克黄鼎^⑫，河南淅川徐家岭 M9 楚式升鼎^⑬、M10 楚式升鼎^⑭等属于此型。

(二) 楚系青铜爬兽的年代

楚系青铜器形成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其后流行于楚文化圈，直至秦灭楚^⑮。楚系青铜爬兽的流行年代大体相当，只是各个型式早晚关系不同。

A 型 I 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此式爬兽的年代集中于春秋时期，其中年代较早的有：随州枣树林 M190 出土一对爬兽耳方壶，年代为春秋中期早段^⑯；淅川下寺 M2 出土两件铸有爬兽的高，其墓主为楚国令尹公子午，年代为春秋中期^⑰。

A 型 II 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战国早期。此式爬兽年代跨度较大，其中年代较早的有：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八件爬兽耳簋、一对爬兽耳圆壶、一件爬兽耳圆尊、一对爬兽耳方鉴，年代为战国早期^⑱；淅川徐家岭 M10 出土爬兽耳圆壶两件，年代为战国早期^⑲。

Ba 型 I 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期。此式爬兽年代跨度较大，其中年代较早的有：淅川下寺 M2 出土王子午鼎、铜禁上皆铸有此式爬兽，年代为春秋中期^⑳。

Ba 型 II 式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战国早期。此式爬兽年代较为集中，其中较早的有：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九件铸有爬兽的楚式升鼎，年代为战国早期^㉑。

Bb 型爬兽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此式爬兽年代较为集中，其中较早的有：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铸有此式爬兽的楚式升鼎九件，年代为春秋晚期^㉒。淅川和尚岭

M1 出土的两件克黄升鼎铸有此式爬兽，年代为春秋晚期^㉓。

A 型爬兽多见于壶类器物上，数量多为两个，代替双耳的作用。A 型爬兽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其中，A 型 I 式主要在春秋时期流行，II 式主要在战国时期流行。B 型爬兽多见于楚式升鼎上，数量多为四个或六个，起到装饰作用。B 型爬兽也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流行，部分单位可以同时见到 A 型和 B 型爬兽。其中，Ba 型 I 式和 A 型 I 式出现的时间接近，但前者直至战国中期仍有发现。Bb 型 II 式流行于战国时期。Bb 型流行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还可以见到。

二、楚系青铜爬兽的来源

楚系 A 型、B 型青铜爬兽均来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西周时期一些弄器上铸有青铜爬兽。陕西西安张家坡 M163 出土一对邓仲牺尊，年代为西周中期，铸有三只龙形爬兽，形态各不相同。胸前龙形爬兽，回首，塌背，卷尾；颈后龙形爬兽，背首，塌背，卷尾；臀部龙形爬兽，回首，拱背，卷尾（图 3-4）^㉔。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一件别人守门方鼎，鼎四角铸有四只龙形爬兽，回首，塌背，卷尾，年代为西周中期（图 3-1）^㉕。陕西宝鸡茹家庄窖藏出土一件别人守门方鼎，形制与前者稍有区别，四角铸有龙形爬兽，长边中间铸有虎形爬兽，年代为西周晚期。其中，龙形爬兽，回首，垂首曲颈成环，塌背，卷尾（图 3-2）；虎形爬兽，背首，塌背，卷尾（图 3-3）^㉖。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盒 M63: 123，四壁铸有四只龙形爬兽，回首，吐舌，头颈部构成圆环，塌背，年代为西周晚期^㉗。上述青铜爬兽有明确的出土背景，均位于

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另外，内蒙古小黑石沟出土一件别人守门方鼎 M8501: 1^㉘，器型、爬兽造型等特征与庄白一号窖藏别人守门方鼎相同，可能是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流传过去的。

西周时期一些水器上也铸有青铜爬兽。陕西扶风庄白村墓葬出土一件鬯父盃，铸有龙形爬兽，回首，拱背，卷尾，年代为西周中期（图 3-5）^㉙。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盃，铸有龙形爬兽，回首，吐舌，垂首曲颈成环，拱背，卷尾（图 3-6），年代为西周晚期。同时伴出的匝，铸有龙形爬兽，背首，衔沿，拱背，卷尾^㉚。上述水器上的爬兽主要是作为器物，都出土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以上可知，西周时期的青铜爬兽数量较少，主要见于弄器和水器上。这些青铜爬兽龙形为主，回首或背首，体态修长，塌背或拱背，卷尾，其与楚系青铜爬兽特征相近，应是楚系青铜爬兽的来源。同时，弄器上和水器上的青铜爬兽承担的功用有些许不同。弄器上的青铜爬兽主要起到装饰作用，增加青铜器的繁缛程度。水器上是将器设置成爬兽造型，既作为器物的把手，也起到装饰的效果。前者被楚系青铜爬兽中的 B 型所承袭，后者被楚系青铜爬兽中的 A 型所承袭。

三、楚系青铜爬兽的使用及其仿制

通过对青铜爬兽使用者身份的考察，可以了解青铜爬兽代表的社会等级，进而考察青铜爬兽仿制的社会背景。

青铜爬兽使用者多为楚文化的高级贵族。楚系青铜器中装饰有爬兽的，多为楚式升鼎、方壶。从其发现情况来看，多存在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属于高等级贵族专用的青铜礼器组合。楚式升鼎是楚系

礼器组合的核心器物之一^⑤。壶，特别是方壶，则是两周时期高级贵族的核心理器^⑥。以上可知，爬兽多铸在重要的青铜礼器上。从空间上来看，随葬青铜爬兽器墓葬的墓主多为楚国高级贵族或是楚文化圈内诸侯国国君（表1）。从时间上来看，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楚系青铜爬兽一直流行于高级贵族墓葬中。不过，到了战国晚期，等级较低的墓葬中也出土青铜爬兽。如荆州子陵岗 M64，一棺一椁，随葬一件铜鼎，墓主身份应是士，其伴出的铜罍上铸有爬兽，与等级较高墓葬中铸有爬兽的器类相异。

现有资料显示，西周文化的爬兽主要见于青铜器上，楚文化爬兽来源于西周文化，最初主要应用于青铜器上。楚系青铜爬兽在楚文化圈流行后，出现了不同材质器物仿制青铜爬兽，主要分为漆木器和陶器仿制两类。漆木器仿制青铜爬兽，以枣阳九连墩 M2 为例。九连墩 M2 墓主邵垞夫人，是楚国的高级贵族，下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出土 5 件漆木楚式升鼎、一对漆木大方壶上设有爬兽，爬兽的造型与楚系同类青铜器上的爬兽造型相近（图 4-1）^⑦。陶器上仿制青铜爬兽更为流行。陶器上仿制青铜爬兽可分为两类：一类爬兽制作繁缛与青铜爬兽相近，如江陵望山 M1 出土 3 件陶升鼎、一对陶方壶、1 件盥缶设有爬兽，其爬兽造型与青铜器上的爬兽造型相近（图 4-2）^⑧；一类爬兽制作简单，只捏

表1 随葬楚系青铜爬兽器墓葬统计表

墓号	青铜鼎簋组合	青铜爬兽器	墓主 / 身份	年代	备注
叶县旧县 M4	楚式升鼎 7+ 簋 2	楚式升鼎 3 ^⑨	许灵公 / 国君	春秋中期	被盗
新郑郑公大墓	升鼎 9+ 簋 8	方壶 4+ 罍 1	郑公 / 国君	春秋中期	
随州枣树林 M190	鼎 5	方壶 2	曾公喙 / 国君	春秋中期	被盗
浙川下寺 M1	楚式升鼎 2+ 簋 1	楚式升鼎 2+ 方壶 2	王子午夫人 / 高级贵族	春秋中期	
浙川下寺 M2	楚式升鼎 7+ 簋 2	楚式升鼎 7+ 鬲 2+ 禁 1	王子午 / 令尹	春秋中期	被盗
寿县蔡侯墓	楚式升鼎 7+ 簋 8	楚式升鼎 7+ 方壶 2	蔡侯 / 国君	春秋晚期	
浙川和尚岭 M1	楚式升鼎 2	楚式升鼎 2	克黄 / 高级贵族	春秋晚期	被盗
浙川徐家岭 M9	楚式升鼎 3	楚式升鼎 3	不明 / 高级贵族	春秋晚期	被盗
随州曾侯乙墓	楚式升鼎 9+ 簋 8	楚式升鼎 9+ 簋 8+ 圆壶 2+ 方鉴 1+ 尊盘 1	曾侯乙 / 国君	战国早期	
浙川徐家岭 M10	楚式升鼎 5+ 簋 4	楚式升鼎 5+ 圆壶 2	子辰 / 大夫	战国早期	
随州擂鼓墩 M2	楚式升鼎 9+ 簋 8	方壶 2	曾侯 / 国君	战国中期	
江陵天星观 M1	楚式升鼎 1	楚式升鼎 1	邛阳君 / 上卿	战国中期	
江陵天星观 M2	楚式升鼎 5+ 簋 5	楚式升鼎 5	邛阳君夫人 / 高级贵族	战国中期	
枣阳九连墩 M1	楚式升鼎 5+ 簋 8	楚式升鼎 5+ 簋 8+ 方壶 2	邵垞 / 大夫	战国中期	
枣阳九连墩 M2	楚式升鼎 5+ 簋 8	圆壶 2	邵垞夫人 / 高级贵族	战国中期	
寿县李三孤堆	楚式升鼎 9+ 簋 8	楚式升鼎 9	楚王 / 国君	战国晚期	被盗
荆州子陵岗 M64	鼎 1	罍 1	不明 / 士	战国晚期	

出动物的大体形状，如襄阳山湾 M34 出土 1 件陶罍设有爬兽耳，犬形，背首，拱背（图 4-3）^⑩，又如安徽六安西窑厂 M2 出土 1 件陶罍，爬兽耳，背首，拱背，卷尾（图 4-4）^⑪。

陶爬兽器流行于低级贵族，应是这一阶层的文化传统。据表 2 可知，随葬陶爬兽器墓主身份多为士或下大夫，是楚国等级较低的贵族，但两者随葬的礼器组合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如若随葬陶爬兽器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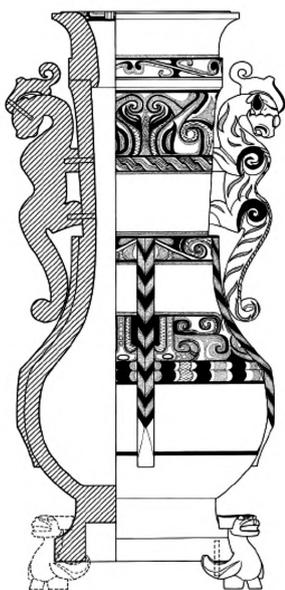


图 4-1 枣阳九连墩漆木方壶 M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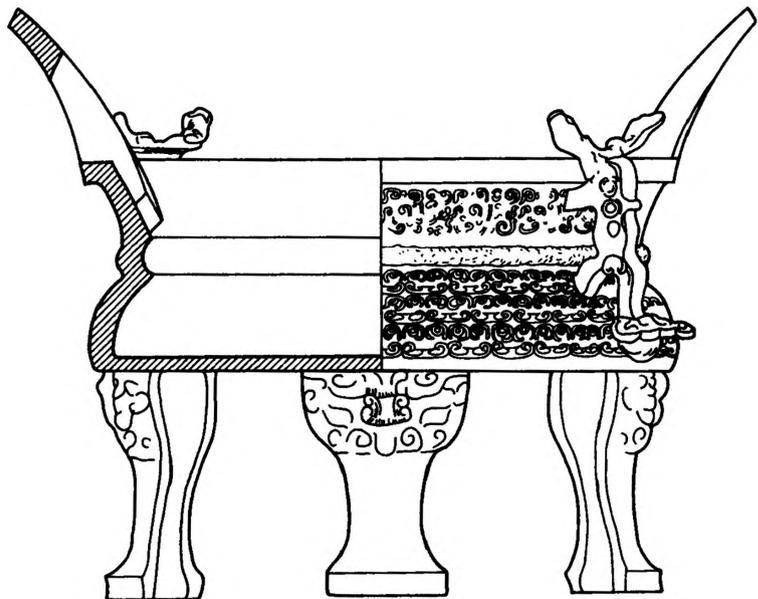


图 4-2 江陵望山陶鼎 WM1:T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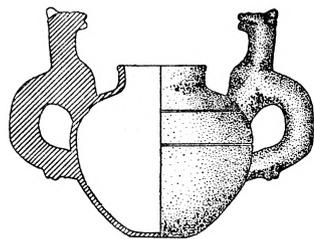


图 4-3 襄阳山湾陶罍 M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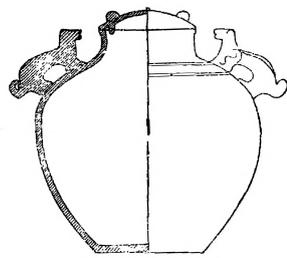


图 4-4 六安西窑厂 M2 陶罍

图 4 楚系漆木、陶质爬兽

表2 随葬楚系陶爬兽器墓葬统计表

墓号	葬具	陶爬兽器	墓主身份	年代	出处
平顶山应国墓地 M10	一棺一椁	楚式升鼎 3+ 方壶 2	下大夫夫人	春秋晚期	⑧
湖南长沙浏城桥 M1	一棺两椁	楚式升鼎 3+ 鬲 8+ 方壶 2	下大夫	春秋晚期	⑨
安徽六安西窑厂 M2	两棺两椁	鬲 1	下大夫	战国早期	⑩
湖北江陵溪峨山 M3	一棺一椁	鬲 2	士	战国早期	⑪
湖北江陵望山 M1	两棺一椁	楚式升鼎 3+ 方壶 2+ 盨缶 1	下大夫	战国中期	⑫
湖南长沙三公里 M1	两棺两椁	楚式升鼎 2	下大夫	战国中期	⑬
河南正阳苏庄 M1	一棺三椁	方壶 2	下大夫	战国中期	⑭
湖北江陵溪峨山 M1	一棺一椁	鬲 1	士	战国中期	⑮
湖北江陵溪峨山 M10	不明	鬲 2	士	战国中期	⑯
湖北襄阳山湾 M34	一棺一椁	鬲 1	士	战国中期	⑰
湖北江陵武昌义地 M13	一棺一椁	鬲 2	士	战国中期	⑱
湖北荆州施家地 M1059	一棺一椁	鬲 1	士	战国中期	⑲
湖北荆州施家地 M1058	一棺一椁	鬲 1	士	战国晚期	

的墓主身份为士，则多伴出立耳圜底鼎，陶爬兽多装在陶鬲上。如若随葬陶爬兽器墓葬的墓主身份为下大夫，则多伴出楚式升鼎或方壶，爬兽多装在楚式升鼎或壶上，这与随葬青铜爬兽器墓葬现象一致。随葬陶爬兽流行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考虑到同时期荆州子陵岗 M64 的墓主也是士，随葬爬兽耳鬲可能不是偶然现象，暗示这一时期楚国等级较低贵族对上层随葬爬兽器这一社会风尚的仿效，但将爬兽多设在鬲上，应是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本阶层的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大夫这个阶层即使是没有财力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也会用陶器仿制一套显示其身份等级，而不会选择爬兽耳鬲。

四、其他区域青铜爬兽特征

考察其他区域爬兽可以了解东周时期不同文化圈的相互关系。

东周时期其他区域发现的青铜爬兽主要出自墓葬。这些青铜爬兽有以下特点：一是晋文化圈是青铜爬兽器的另一处流行区域；二是爬兽耳铜鬲的流行区域较广。

（一）晋文化圈流行青铜爬兽器

晋文化圈发现青铜爬兽器的地点、数量仅次于楚文化圈，其青铜爬兽造型、器类、使用者身份与楚系青铜爬兽有着明显的区别，应是不同的文化传统。

晋系青铜爬兽造型与楚系青铜爬兽不同。楚系青铜爬兽以龙形为主，体态修长，或有大角，吐舌较长。晋系青铜爬兽则以

虎形为主，体态粗壮，无角，吐舌较短或不吐舌。如山西太原金胜村 M251 出土方壶 4 件，铸有虎形爬兽，回首，吐舌，垂首卷颈成环，塌背，卷尾（图 5-1）^⑳。又如山西襄汾陶寺北 2015M1 出土方壶 1 件，铸有虎形爬兽，回首，拱背，卷尾（图 5-2）^㉑。再如山西襄汾陶寺北 2017M3011 出土圆壶一对，铸有虎形爬兽，回首衔环，塌背，卷尾（图 5-3）^㉒。前述可知，周文化爬兽多为龙形，也有少量虎形，晋系爬兽应也是承袭周文化爬兽，但选择了少见的虎形作为其主要造型。

晋系铸有青铜爬兽器类与楚系青铜爬兽器类不同。楚系青铜爬兽多铸于升鼎和壶上，晋系青铜爬兽多铸于壶上。现有资料表明，在山西太原金胜村 M251、M673^㉓、M674^㉔，山西襄汾^㉕，山西襄汾陶寺 2015M1、2017M3011，山西侯马上马 M15^㉖，河北邢台南大汪^㉗，河北涉县北关凤凰台 M1^㉘，河南辉县^㉙，河南三门峡后川 M2040^㉚等地均出土爬兽耳壶。此外，山西临汾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M93 出土 1 件方彝^㉛，山西长治分水岭 M26 出土 2 件鼎^㉜、M270 出土一对鬲^㉝，山西浑源李峪出土一对豆^㉞，河南三门峡后川 M2061 出土 1 件盘^㉟等铸有爬兽。这些爬兽器类最多只发现一次，暗示其不是晋文化铸有爬兽的主要器类。

晋系青铜爬兽器使用者的身份与楚系青铜爬兽不同。晋系青铜爬兽器的出土数量虽然不少，但资料公布多不全，仅有以下几例可以判断使用者身份。临汾天马曲村晋侯墓地 M93，葬具为两棺一椁，随葬升鼎 5 件，伴出 1 件爬兽方彝，墓主晋文侯为晋国国君。太原金胜村 M251，葬具为三棺一椁，随葬升鼎 7 件，伴出爬兽耳方壶 4 件，墓主赵卿身份为晋国上卿^㉞。长治分水岭 M26，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升鼎 5 件，伴出 2 件爬兽鼎，墓主身份为大夫。长治分水岭 M270，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升鼎 5 件，伴出爬兽耳鬲 2 件，墓主身份为大夫。三门峡后川 M2040，葬具为双棺一椁，随葬升鼎 5 件，伴出爬兽耳方壶和圆壶各 2 件，墓主身份为高级贵族。侯马上马 M15，葬具为两棺一椁，随葬升鼎 3 件，伴出爬兽耳圆壶 2 件，墓主身份为士。三门峡后川 M2061，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升鼎 1 件，伴出爬兽耳盘 1 件，墓主身份为士。上述可知，晋文化圈内高级贵



图 5-1 太原金胜村方壶 M251:579



图 5-2 山西襄汾陶寺北方壶 2015M1:21



图 5-3 襄汾陶寺北 2017M3011 圆壶

图 5 乙类 Ba 型倒置纹饰

族和低级贵族均可使用青铜爬兽，且多见于大夫及以下的贵族墓葬中，而楚系爬兽器多见于国君一级的贵族墓葬中。

(二) 爬兽耳铜甬的流行区域较广

爬兽耳铜甬出现在众多诸侯国乃至周临区域。河南洛阳西工区 C1M3498^⑧和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⑨出土爬兽耳铜甬，该区域为东周时期的王畿地区。江苏丹徒谏壁粮山墓葬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吴国贵族^⑩。安徽蚌埠双墩 M1 出土一对爬兽耳铜甬，墓主为钟离国君柏^⑪。山东枣庄徐楼 M1 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费国贵族^⑫。河南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卫国公室^⑬。长治分水岭 M270 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晋国贵族。河北怀来甘子(字)堡 M2 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玉皇庙文化贵族^⑭。北京延庆玉皇庙 M2、M18、M250 出土爬兽耳铜甬，墓主为玉皇庙文化贵族^⑮。上述可知，爬兽耳铜甬的分布范围较广，使用者身份也较为复杂，有诸侯国国君，也有最低等级的贵族士，还有周邻文化的贵族。尤其是在玉皇庙文化数个地点发现，暗示了玉皇庙文化与华夏地区交流频繁，考虑到这一时期，青铜器商品化程度较高，这些爬兽耳铜甬可能是作为商品贸易至玉皇庙文化。

结语

楚系青铜爬兽根据头的朝向可以分为两型。其中 A 型爬兽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主要见于壶类器物上，数量多为两个，有代替双耳的作用。B 型爬兽的流行年代与 A 型爬兽大体相当，多见于楚式升鼎上，数量多为四个或六个，起到装饰作用。且两型爬兽常常共存，暗示不同形制的爬兽与器类的相关性较大。两型爬兽出现的时间和楚系青铜器风格的形成时间相近，可认为是楚系青铜器的风格之一。

楚系青铜爬兽来源于西周文化的核心区域。西周时期周原、丰镐等遗址已经发现有上述两型青铜爬兽，楚系青铜爬兽承袭西周文化爬兽。同时，西周文化的爬兽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是西周文化爬兽的数量较少，多见于弄器和水器上；二是西周文化的爬兽部分发现于窖藏；三是西周文化的爬兽只有青铜质地；四是西周文化的爬兽多为回首，即使是装饰作用的爬兽也是如此。

楚系青铜爬兽与青铜器使用理念发生转变。楚系青铜爬兽多为楚文化圈的高级贵族使用，并成为当时青铜器装饰的一种

风尚，因而出现了漆木质和陶质的仿制爬兽，特别是陶质爬兽多见于下大夫和士等较低等级的贵族阶层。楚系青铜爬兽多装饰于楚式升鼎和壶等器物上，这类器物是楚国礼器的核心组合之一。楚系爬兽造型多吐长舌，这类行为是人和动物表现诙谐的一种方式，暗示楚系爬兽是一种偏向于世俗化的形象。通过与西周文化爬兽对比可知，西周文化的爬兽多装饰于弄器和水器上，其中弄器多不作为礼器，而楚文化在青铜礼器上装饰世俗化的爬兽，应是东周时期铜器的整体风格向世俗化转变背景下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暗示了青铜爬兽地位升高，是楚文化圈内高等级的附件。

爬兽耳甬的流行是东周文化圈文化认同的象征。东周时期爬兽耳铜甬可以在东周文化的大部分地区发现，暗示了这种装饰工艺在东周文化圈的流行。战国时期，楚文化圈内的低级贵族阶层流行陶质爬兽耳甬，也反映了低级贵族形成的文化认同。因此可以说，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阻碍诸侯国之间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也是秦国实现大一统的基础。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2024QQJH06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3YFFF0906600)和课题(2023YFFF0906603)也给予了资助。

注释：

- ①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 125 页；杨式昭：《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2005，第 75 页。
- ②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叶县文化局：《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9 期。
- ③ 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台湾历史博物馆)：《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第 108—117 页。此件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见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111—117 页。
-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第 125 页。
- ⑤ 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10》，龙门书局，2018，第 381 页。
- ⑥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第 48 页；深圳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华》，文物出版社，2012，第 182 页。
- 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 190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3 年第 1 期。

- ⑧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第 8 页；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第 146 页。
-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第 264 页；淅川县博物馆：《浙川楚国青铜器精粹》，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第 178 页。
- ⑩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第 207—228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文物出版社，1996，第 139 页。
- ⑪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文物出版社，2008，第 65 页；深圳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礼乐汉东·湖北随州出土周代青铜器精华》，第 203 页。
- ⑫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 年第 7 期。
- ⑬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第 43 页。
- ⑭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 年第 3 期。
- ⑮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 年第 6 期。
- ⑯ 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子陵岗》，文物出版社，2008，第 154 页。
- 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第 411 页。
- 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 年第 1 期。
- ⑲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 54 页。
- ⑳ 同上书，第 112—115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第 3 页。
- ㉑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 126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第 77 页。
- ㉒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 42 页；彩版一。
- ㉓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229 页。
- ㉔ 曹淑琴、殷玮璋：《寿县朱家集铜器群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李零：《论东周时期楚国的典型铜器群》，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中华书局，1992；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 79—82 页。
- ㉕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192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第 110 页。
- ㉖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1 发掘简报》；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12》，龙门书局，2018，

- 第 487 页。
- ②⑦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第 96—98 页。
- ②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
- ②⑨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第 63 页。
- ③①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 ③②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第 7 页；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第 138 页。
- ③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 7 页；浙川县博物馆：《浙川楚国青铜器精粹》，第 1 页。
- ③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 174 页。
- ③⑤ 同上书，第 248、249 页。
- ③⑥ 袁艳玲：《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科学出版社，2019，第 191、192 页。
- ③⑦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 190 号墓发掘报告》。
- ③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 332 页。
- ③⑨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461—464 页。
- ④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
- ④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 332 页。
- ④③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461—464 页。
- ④④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第 17 页。
- ④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 120 页。
- ④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 162 页；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5）》，文物出版社，1996，第 166—168 页。
- ④⑦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3 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五卷》，巴蜀书社，2005，第 927 页。
- ④⑧ 高次若、刘明科：《宝鸡茹家庄新发现铜器窖藏》，《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4 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 310 页。
- ④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6）》，文物出版社，1997，第 58—60 页。
- ④⑩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第 264 页。
- ④⑪ 扶风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或诸器》，《文物》1976 年第 6 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七卷》，巴蜀书社，2005，第 1393—1397 页。
- ④⑫ 梁星彭、冯孝堂：《陕西长安、扶风出土西周铜器》，《考古》1963 年第 8 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二卷》，巴蜀书社，2005，第 252—262 页。
- ④⑬ 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 70 页；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 1000 至前 250 年的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 373 页。
- ④⑭ 袁艳玲：《楚式鼎的分类、组合及其礼制涵义》，《考古》2015 年第 8 期；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第 126—131 页；罗泰：《宗子维城：从考古材料的角度看公元前 1000 至前 250 年的中国社会》，第 373 页。
- ④⑮ 另 4 件被盗，情况不明。
- ④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文物考古队：《湖北枣阳九连墩 M2 发掘简报》。
- ④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第 30—37 页。
- ④⑱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 年第 2 期。
- ④⑲ 安徽省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城西窑厂 2 号楚墓》，《考古》1995 年第 2 期。
- ④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 年第 4 期。
- ④㉑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 ④㉒ 安徽省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城西窑厂 2 号楚墓》。
- ④㉓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溪峨山楚墓》，《考古》1984 年第 6 期。
- ④㉔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第 30—37 页。
- ④㉕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三公里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 年第 12 期。
- ④㉖ 驻马店地区文化局、正阳县文化局：《河南正阳苏庄楚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 2 期。
- ④㉗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溪峨山楚墓》。
- ④㉘ 江陵县博物馆：《江陵溪峨山楚墓》，《江汉考古》1992 年第 4 期。
- ④㉙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
- ④㉚ 江陵县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义地楚墓》，《文物》1989 年第 3 期。
- ④㉛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市施家地楚墓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8 期。
- ④㉜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 251 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9 期；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4》，龙门书局，2018，第 408 页。
- ④㉝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第 128—131 页。
- ④㉞ 同上书，第 137—143 页。
- ④㉟ 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 244 页。
- ⑤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故宫出版社，2019，第 320—323 页。
- ⑤② 同上书，第 443—444 页。
- ⑤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第 58 页。
- ⑤④ 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2》，龙门书局，2018，第 107 页。
- ⑤⑤ 同上书，第 119 页。
- ⑤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第 447—449 页。
- ⑤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五）》，科学出版社，1994，第 43 页。
- ⑤⑧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 ⑤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第 273 页。
- ⑤⑩ 同上书，第 346 页。
- ⑤⑪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8）》，文物出版社，1995，第 38 页。
- ⑤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五）》，第 58—60 页。
- ⑤⑬ 侯毅：《试论太原金胜村 251 号墓墓主身分（份）》，《文物》1989 年第 9 期。
- ⑤⑭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区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8 期。
- ⑤⑮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第 46 页。
- ⑤⑯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东周铜器》，《考古》1981 年第 5 期。
- ⑤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春秋钟离君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3 年第 2 期。
- ⑤⑱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峰城区文广新局：《枣庄市峰城徐楼东周墓葬发掘报告》，载《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
- ⑤⑲ 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第 16 页。
- ⑤⑳ 贺勇、刘建中：《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文物春秋》1993 年第 2 期。
- ⑤㉑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军都山墓地·玉皇庙》，文物出版社，2007，第 903、904 页。
- （席乐，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